

《野草》中的“陌生人”世界和城市批判

张 娟^{*}

【摘 要】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国民启蒙裹挟在世界性的城市化潮流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城市社会还处于动荡和未成形的状态中,就已经以启蒙的姿态介入到对社会的观察和批判中去。本文主要从《野草》中的城市“陌生人”形象出发,对《野草》中涉及到城市现实空间的篇章进行市民形象和城市伦理分析,探讨身处早期城市社会的鲁迅对市民底层空间的观察和反思。《野草》中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陌生人”群体,他们无处不在,形成对“精神界战士”的鲁迅构成牵制、拉扯和制约的力量;他们通过“立论”与“闲谈”,形成“陌生人”的日常生活策略;他们在“物”的主宰下形成对金钱异化的群体。鲁迅对“陌生人”群体的批判体现了他在城市写作中更为重视在精神层面对都市生活中“人”的思考和发现,从而也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市民批判。

【关键词】 鲁迅;《野草》;陌生人理论;城市批判

近年来,除了“乡土鲁迅”、“政治鲁迅”之外,“城市鲁迅”也成为重要的研究维度,但现有城市鲁迅研究多集中在海派研究和城市社会学研究,事实上,鲁迅对城市物质表象关注度并不高,更注重对现代市民精神的探索和追问。基于鲁迅对现实社会深刻的“介入机制”和“反思立场”,鲁迅在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对早期的城市社会也记录下了自己的观察和反思。在文本表现、文体选择、市民价值思考等层面都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城市思想文化资源。本文主要从《野草》中的城市“陌生人”形象出发,对《野草》中涉及到城市现实空间的篇章进行市民形象和城市伦理分析,探讨身处早期城市社会的鲁迅对市民底层空间的观察和反思。

《野草》中的陌生人社会是与熟人社会相对存在的。传统的乡村是熟人社会,城市则是陌生人社会,城市摆脱了土地的束缚,通过交换和商业关系将人群聚集在一起,容纳并召唤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以不同的身份共处一个空间,形成一个差异化的陌生人空间。陌生人研究是城市社会学的重要领域,在城市生活中,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是城市的本质特征,他们是城市交往的基本要素,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到,中国传统社会是依靠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组织起来的共同体,“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①鲁迅的

^{*}文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211189。本文为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11&ZD114)、东南大学2018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人文社科)重大引导课题“鲁迅城市写作的精神向度及当代意义”(2242018S10032)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1页。

《呐喊》、《彷徨》中的大部分小说描写的都是熟人社会，祥林嫂、魏连没、爱姑、七斤老太等等形象都和“我”在地缘、血缘、宗法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到了《野草》，除了《风筝》这篇回忆童年的往事中写自己的弟弟以外，其余的作品中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在文本中出现的都是与“我”在都市空间中相遇，却无法构成熟人社会的情感牵连的“陌生人”群体。

从空间角度来看，《野草》的写作主要包括两个空间，一个是想象空间，另一个是现实空间，而这个现实空间，从鲁迅写作《野草》的地点来看，他当时居住在北京，从文本空间来看，也是一个以北京城市为原型的一个典型的都市空间，如《秋夜》中的书房，《求乞者》中的高墙，《死后》我躺着的大街……在这样一个城市空间里，《野草》中大量出现了“陌生人”形象，他们有的是都市中“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的求乞者，有的是围观的“路人们”，有的是行走的“过客”，有的是施暴者，有的是高谈阔论者。他们都不是主角，但是他们却以一种强大的“悖论”式的力量成为一种和“这样的战士”、“死火”、“叛逆的猛士们”相对应的日常生活的存在。这些“陌生人”们具有怎样的群体特征？鲁迅为何如此关注这个群体？对“陌生人”群体诸多批判和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有怎样的关联？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一、日常生活的主体：《野草》中的“陌生人”

鲁迅在《野草》中的灵魂紧张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而对“精神界战士”的鲁迅构成牵制、拉扯和制约的力量是什么呢？研究者从各个向度进行过分析，本文主要想讨论一下日常生活的世俗力量。首先就是无处不在的“陌生人”，“陌生人（stranger）”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我们首先注意的是鲁迅写作的空间不是典型的传统文人书斋，他关注的灵魂问题亦是现代人才遭遇的精神困境。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是“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①，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陌生人成为城市生活的主体，“陌生人”是现代性的主体建构的重要部分。

在木山英雄看来，《野草》是“主体建构的逻辑及其方法”，也就是作为文学家，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是怎样成为鲁迅的。《野草》作为一部独白的散文诗集，这一系列中散文中有一个作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一形象以各种变体出现，有时是灯下思考或路上行走的知识分子，有时是徘徊于明暗之间的影，有时是向路人复仇的裸体男女，有时是被背叛的“神之子”，有时是以行走为悬置的目标的过客，有时是奔驰在冰山间的死火，有时是复仇的母亲，有时是举着投枪的战士……这些变体都可以说是鲁迅“理想自我”的建构和想象。与这一精神主体相对应的就是作为群体的“陌生人”形象，他们是《野草》中的另一个群体性主角。这些看客和路人无处不在，他们以围观的姿态消解了意义，嘲笑着英雄，解构着启蒙的悲剧。鲁迅在《野草》中通过死亡和梦境建构起来了一个精神界战士的形象，但这个精神界战士生活在无处不在的“陌生人”中间，他们才是日常生活的常态。

《复仇》中出现了看客和路人的形象，“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马蚁要扛鳌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拼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豫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②“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③《复仇》（其二）中兵丁们戏弄、打、吐、钉杀以色列的王，路人辱骂，祭司长和文士戏弄，就连同钉的强盗也讥诮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页。

② 鲁迅：《复仇》，《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

③ 鲁迅：《复仇》，《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

他;《希望》中他把希望寄托于身外的青春,然而世上的青年多衰老,就连身外的青春也逝去了,只能由他自己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死后》中则描写了死后的看客们,而他们的议论并没有自己的观点,归纳起来都是毫无意义的感叹词,一个陌生人的死对这个社会毫无意义,巡警在看到尸体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侦破死因,而是抱怨为什么要死在这里,在都市社会里,在地上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力,也并没有任意死亡的权力。“集合成群的人的思想感情全部朝向统一的方向,丧失了自觉的个性成了一种集体心理。”^①这些群体看客的形象重要的特征就是自我个性的消失,聚合成为现代社会的“乌合之众”。

《求乞者》中“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②类似于《秋夜》“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开头,具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而“我”和同样在走路的几个人,虽然行为类似,却互不相识,彼此也没有相识的欲望,这是齐美尔所讲的“陌生人”概念里最核心的内涵,“同时包含着近和远的方式”,^③这些陌生人身处同一空间,身体距离很近,却彼此毫无了解,并且没有了解的欲望,彼此之间有一种深刻的隔膜感。而求乞的孩子也是一个陌生人,因为陌生,所以不会产生“熟人社会”的“共情”感。假如此刻是在熟人社会,求乞者是“我”认识的人,“我”大概也会像面对祥林嫂一样,踌躇自己应该怎么回答,并给出一个对方期待的答案,这是典型的“熟人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模式,但是此刻在这样一个互相不必负责的“陌生人社会”,“我”也表现出惊人的冷漠和不信任,“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④这种根据求乞者的外表和神情推测他们缺乏自尊的弄虚作假,正是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初次相遇的典型交往方式,这种判断不免会草率而带有明显的个人感情色彩,但同时“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没有未来的事情”^⑤正因为不必要负责,所以“我”可以界定“陌生人”,并且无需担心自己的判断失误。鲁迅在《求乞者》里强烈的道德自信和他《在祝福》、《我要骗人》中面对熟人社会的祥林嫂、母亲等表现出的犹疑不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一种陌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的不同道德情感。

《野草》中大量出现的“陌生人”形象,其实在鲁迅的小说中并不陌生,和《野草》写作于几乎同期,也同样发表在《语丝》的1925年的小说《示众》,虽然后来被收入《彷徨》,但也是有着强烈的《野草》风格的小说,小说以漫画特写的方式描写了一群看客,这些看客彼此都是陌生人,对于自己所看之物,也是陌生人,他们对于他人的悲苦是冷漠的,无知的,毫无同情心的。这群看客也同样出现在《孤独者》魏连殳祖母的葬礼上,《阿Q正传》中处决阿Q的刑场上,《铸剑》中出殡的队伍里,社会分化加剧,人与人之间彼此陌生,道德义务日益薄弱。鲁迅作品中无处不在的“陌生人”形象,其实正是抓住了早期中国城市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变迁的本质特征,刻画失落了地缘、血缘的灵魂。

二、“立论”与“闲谈”：“陌生人”的日常生活策略

《野草》中还有几篇文章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描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话语策略。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生活中,当人们遭遇陌生人时,往往会以仪式性的客套和寒暄,表现出礼貌的疏远(polite estrangement)的刻意控制。^⑥霍夫曼的“世俗的不经意”(civil inattention)范式,往往是陌生人相遇

①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② 鲁迅:《求乞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1页。

③ [德]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5—346页。

④ 鲁迅:《求乞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1页。

⑤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第147—148页。

⑥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70页。

时承诺的基本类型。^①这种“转瞬即逝的交往形式”^②显示出一种陌生关系所特有的暂时性和公正性。由于陌生人社会缺乏熟人社会的信任基础,会导致对陌生人的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会导致对陌生人的困境冷漠旁观。这正是陌生关系本身的“短暂、瞬间即逝和偶然”等现代特质造成的。

鲁迅的《立论》描写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闲谈,在《野草》的神鬼气氛中,这篇的平实显得非常特别,对《立论》的理解也往往放在对中庸之道的批判,对孔孟虚伪的市侩主义哲学的讽刺等等。但是从日常生活理论角度重读这篇小文,却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立论》里的祝贺满月的市民空间构筑了一个充满世俗味道和功利气息的市民社会。《立论》中描述了中国常见的世俗场景,一群看客前去满月贺喜,说死的必然,说富贵的是谎话,但说谎的大家都开心,说必然的遭致痛打,这种市民相处逻辑实质就是海德格尔谈到“闲谈”,在海德格尔看来,所谓“闲谈”,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常人”的交谈方面,这种交谈有时并不仅仅通过语言传达意义,交谈的行为本身更为重要。“只要是说过了,只要是名言警句,现在都可以为言谈的真实性和合乎事理担保,都可以为对真实性和合乎事理的领悟担保。因为言谈丧失了或从未获得对所谈及的存在者的首要的存在联系,所以它不是以源始地把这种存在者的据为己有的方式传达自身,而是以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的方式传达自身”。^③在常人的社交中,不但精确的语言可以传情达意,不表明态度,人云亦云也可以成为一种成功的社会策略,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城市社会中真实而特殊的社交常态。

在鲁迅的梦境中,

一户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全家都很高兴,很多宾客前来贺喜。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那么……。阿唷!哈哈! Heh e! he, he he he he!’”^④

这些宾客的贺辞就是一种无意义的“闲谈”。这种只限于皮毛的“常人”身份的闲谈,“保护人们不致遭受在据事情为已有的活动中失败的危险。谁都可以振振闲谈。它不仅使人免于真实领会的任务,而且还培养了一种漫无差别的理解力;对这种理解力来说,再没有任何东西是深深锁闭的”^⑤,通过闲谈,“我”与“他人”得以成为常人,并寄寓在这个世界中,也就是说,这种闲谈就是刻意通过无意义,而构成一种安全的社交,就是“此在日常藉以在‘此’,藉以开展出在世的方式的特性”^⑥《立论》中交谈的都是常人,他们都是按照日常生活的逻辑在进行交流,只有通过这些“常人”,我们才能更有效、更直接地认识“此在”的实质——原初性的日常生活,揭示常人在日常生活中行为逻辑与言语逻辑。正如西美尔在研究“人际交往”的时尚哲学时指出,现代社会中有效的人际交往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比如说不将性格、情绪、命运、幽默、激动、沮丧等个人情绪带入社会场合等。^⑦这种闲谈往往是缺乏灵魂和实质意义的,看起来的敷衍就是社交属性本身,“一起看上去都似乎被真正地领会到了、把握到了、说出来了;而其实却不是如此,或者一切看上去都不是如此而其实却是如此。”^⑧所以,“常人”没有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71页。

②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70页。

③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04—205页。

④ 鲁迅:《立论》,《鲁迅全集》第二卷,1981年版,第207页。

⑤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205页。

⑥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13页。

⑦ 张贞:《“日常生活”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6页。

⑧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10页。

创新,没有洞见,只能停留在“非本真状态”也就是“沉沦状态”之中。这种“闲谈”是一种“此在”的建构方式。鲁迅的《立论》真实描绘了这种处于平庸状态的“常人”的无意义的社交,而这种无意义又维持了日常生活的有序进展,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又是有意义的。

另一篇“闲谈”的作品是《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这篇散文关注聪明人和奴才所在的生活空间。奴才诉苦的时候,聪明人只是随意的附和,配合诉苦的情境做出自己相应的反应,当奴才诉苦自己过的不是人的生活时,聪明人说这着实令人同情,当奴才诉苦做工昼夜无休息时,聪明人叹息着,甚至眼圈要发红到掉泪,但这其实具有某种表演的成分,聪明人安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这空洞的安慰正是鲁迅所讲的“虚妄”,指向正是无意义。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常人”的闲谈、模棱两可正是普通个体的生存状态,也就是所谓的“沉沦”状态,“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怎样从‘大众’中抽身,我们就怎样抽身;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而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①在这种常人的生活状态中,聪明人和奴才都是圆熟而自洽的,而一旦有“傻子”出现,对奴才说的话当真,要帮助奴才改变自己的生活时,首先反抗的不是主人,而正是一直在抱怨的“奴才”,聪明人绝不参与其中,而是在恰当的时候前来慰问,通过无意义的附和获得人际关系的顺畅。正是这种常人的生活状态决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作为勇敢者、叛逆者和行动者的傻子,却成为被整个社会排斥的对象。这种假面式的生活方式竟成为常态,正如笛卡尔所说:“我戴着面具前行”,面具的基本力量在于“可以同时变化和固化身份,而且能够维持世界的秩序”^②。

这里的“闲谈”,“并不应用于位卑一等的含义之下”,反而“意味着一种正面的现象,这种现象组建着日常此在进行领会和解释的存在样式。”^③海德格尔认为日常生活虽然杂乱,而且非本真状态,但这是“存在”的起源,从这个角度来看,日常生活具有建构性的肯定意义。鲁迅在写作《立论》和《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并没有表现出对这种普通市民社交策略的认同,反而有一种反讽和批判。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鲁迅表现出日常生活形态和应对日常生活策略的深刻观察。在散文中,他对庸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与精神选择有更为深入的描绘和反思。之前对于这两篇作品的解读过于拘泥于历史背景,仅仅把“立论”和“闲谈”的常人看作二十年代革命时期的产物,会大大削弱这两篇散文的思考深度和批判价值。事实上,对于城市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生活策略与交际手段,鲁迅有着极为深刻的观察,并且在启蒙主义视角下,对这种交际策略有一种反思和批判。

三、“我的失恋”:被金钱异化的“陌生人”

在陌生人社会中,由于个体之间的差异和隔膜,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有时必须通过“物”来连接,这种“物”的作用的不断放大,也就导致了被金钱异化的“陌生人”群体。列斐伏尔提出,“马克思那里,异化的‘多面性和无所不在性’,表现在生产力上,生产关系上,也在意识形态上,而且还更深刻地,在于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他自己本性的关系上。”^④在陌生人社会,金钱成为一种恒定的标准,所以在城市文学中,描写物质欲望和物质对灵魂的侵蚀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也敏感注意到了这以使现代人陷入灵魂困境的重大命题。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奴才的诉苦也有金钱的不满足,抱怨“伺候

①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56页。

② [英]约翰·马克:《面具:人类的自我伪装与救赎》,杨泽译,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第239页。

③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03页。

④ 陈学民等编:《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斐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主人要钱；头钱从来没分”^①《死后》中就算是死去了，商业社会的金钱交易依然无处不在，勃古斋旧书铺跑外的小伙计依然在推销明板的《公羊传》。在城市社会中必然面对金钱对人性的异化：“现代人把追求金钱作为人生的目的，从而使人的需求严重异化了。在现代人那里，金钱的需要成了唯一的真正需要，以致金钱的数量日益成为人的唯一主要的品质。”^②

发表于1924年12月8日《语丝》周刊第四期的《我的失恋》是典型的批判现代市民功利主义精神哲学的作品。这首拟古的新打油诗用了反讽和悖论的手法，在传统的拟古的格式中，用细仿的表现方式呈现出一种富有现代感的新诗格局。“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③，“山腰”怎会“山太高”？这种悖论的形式形成了反讽，嘲弄的是不能去寻找所爱，并非障碍太大，而是并非心甘情愿，从而找的一种借口。爱人赠我的百蝶巾和我回赠的猫头鹰，也形成一种悖论。百蝶巾、双燕图、金表索、玫瑰花都是传统表达爱情的物质方式，现代爱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纯粹情感体验，而是一种物质的表征，需要用物质的数量和质量来证明爱情的深度。“我”回赠的却是猫头鹰、冰糖壶卢、发汗药和赤练蛇，了解鲁迅的人都知道，这都是鲁迅所爱之物，爱人赠予世俗表达爱情之物，爱情是流俗而面目不清的，“我”回赠灵魂挚爱之物，是对世俗物质爱情的抵抗，也是不同爱情观的冲撞，姑娘“从此翻脸不理我”，这场物质和灵魂之爱如此脆弱，但“我”会为此难过吗？诗歌的另一重反讽出现在“我”身上，“低头无法泪沾袍”，“仰头无法泪沾耳”，“歪头无法泪沾襟”，“摇头无法泪如麻”，这四句话形成结构反讽，如果真的流泪的话，低头是肯定会泪沾袍的，仰头也是肯定会泪沾耳的，而这个情况并没有发生，说明“我”也并非是真的伤心。我对姑娘的回应也并非出自真心的求爱，而是自己的爱情姿态的一种表白，“不知可故兮——由她去罢”最后的语义反讽既有对物质爱情的讽刺，又有对自己灵魂坚守的自嘲。

《野草》还非常敏锐地关注到了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层问题。中国传统社会阶层结构中，“治人与治于人的二分观念，是儒家的社会与政治的基本思想”^④五四以来的现代城市社会，突破了家族和地域伦理模式的限制，“城市居住者之间的阶层划分越来越复杂，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生存竞争也越来越激烈”^⑤《这样的战士》里的“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构成的复杂的市民空间，“这样的战士”面对的斗争对象也格外复杂，就如“无物之阵”；《狗的驳诘》里的主与奴的生存空间，《狗的驳诘》中“我”衣履破碎，像一个乞食者，遇到一只势利的狗，他却说自己在势利上愧不如人，言外之意，人才会分别铜和银，布和绸，官和民，主和奴，人的势利才是一种真正的等级和阶层分别。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思考道德伦理的异质性，在不同阶层的差异中思考市民道德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是《野草》值得重视的社会伦理思考的突破。

鲁迅在《野草》中不仅塑造了不同阶层的市民形象，而且对于现代市民人性的塑造更多展示了其丰富性和复杂性。“五四”时期虽然激烈批判中国传统道德模式，但在一个不断分化的城市社会中如何更加丰富深入地把握不同社会阶层的道德感受与道德伦理，是建立城市道德伦理的关键。如《野草》中《颓败线的颤动》，就是发生在一处私宅，母亲为了活命也为了女儿付出自己的肉体，但是鲁迅在描写这种肉体交易的时候，用的形容词是非常复杂的，这个母亲不仅感受到一般人都会想象到的“饥饿，苦痛，惊异，羞辱”同时还有“欢欣”，“弛缓，然而尚且丰腴的皮肤光润了；青白的两颊泛出轻红，如铅上涂了胭脂水。”^⑥这不是简单的为了金钱出卖肉体的故事，这个女子也在身体的交易中获得了快感，

①鲁迅：《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1页。

②陈学民等编：《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斐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页。

③鲁迅：《我的失恋》，《鲁迅全集》（第2卷），第173页。

④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⑤杜素娟：《市民之路——文学中的中国城市伦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6页。

⑥鲁迅：《颓败线的颤动》，《鲁迅全集》（第2卷），第209页。

这种表现已经有着现代人性的光辉,对于人的身体和伦理复杂性的呈现。《颓败线的颤动》描述了“女性以身体作为金钱交换的条件,同时进一步推演出现代市民社会的道德难题。”^①母亲用卖身得来的钱养大女儿,很多年以后,依然在私宅中,物质的困境已经暂时缓解,“屋的内外已经这样整齐”^②,当饥饿不再是一个迫切的生存难题时,道德的脆弱性就出现,青年夫妻——她的女儿女婿,一群小孩子——她的孙子,都怨恨鄙夷地指责她,此时的母亲不是委屈求全,默默忍受,而是“在深夜中尽走,一直走到无边的荒野”,“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③这种决绝的反抗使得天地动容,也隐喻着现代的自我反抗的桀骜的灵魂的诞生。

四、“陌生人”批判与“立人”思想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国民启蒙是裹挟在世界性的城市化潮流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城市社会还处于动荡和未成形的状态中,就已经以启蒙的姿态介入到对社会的观察和批判中去。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也并未能清晰地意识到产生国民灵魂裂变的多向度的原因,但已经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下了人性的动荡与裂变的样本。本文试图从城市的视角分析《野草》中转型期中国底层市民的精神标本。对鲁迅的城市写作,研究者普遍关注鲁迅和城市空间的关系,比如鲁迅在不同城市文学活动的史料搜集考辨,诸如鲁迅与北京,鲁迅与上海,鲁迅与南京的资料收集整理;还有通过文本探讨鲁迅与城市之关系;或者研究北京、上海城市语境对鲁迅思想和创作的多方位影响……但事实上,鲁迅和中国现代都市作家,特别是以新感觉派等为代表的都市写作者不同的地方在于,鲁迅对都市空间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关注,反而更加重视在精神层面上对都市生活中“人”的思考和发现,从而也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市民批判,鲁迅的写作专注的是“城”与“人”的关系,更注重表现早期市民精神的形态与裂变。

作为“陌生人”的个体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明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公共空间的要素。在农业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个体逐渐走出家庭和宗族制度,在公共空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德国哲学家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指出:“街道纵横、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速度与多样性,表明了城市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础上与小镇、乡村生活有着深刻的对比。城市要求人们作为敏锐的生物应当具有多种多样的不同意识,而乡村生活没有如此的要求。在乡村,生活的节奏与感性的精神形象更缓慢地、更惯常地、更平坦地流溢而出。正是在这种关系中,都市精神生活的世故特点变得可以理解——这正好与更深地立足于感觉与情感关系的城镇生活形成对比。”^④鲁迅深刻认识到“物质”变动带来的“精神”世界的变化,并且敏锐地把这种精神世界的变动诉之笔端,通过国民性批判思考什么才是我们需要的“现代人”。而这个精神召唤的对象,并不是传统的国民,而是在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的正在诞生的一代新人。他关注“在现代中国社会日渐加速的都市化进程中,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现代文人如何调整与都会生活的关系,反省传统文化里精神资源的不足,创造出所需的新的精神资源。”^⑤

鲁迅的写作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城市为背景,他关注正在变化着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市民的精神状态。所谓早期市民意识是指乡村向城市转型过程中的不成熟市民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状态,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人口流动频繁,知识分子逐渐脱离政府机构,人和土地的关系日益松散,经济成为日常生活

①张娟:《都市视角下的鲁迅〈野草〉重释》,《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②鲁迅:《颓败线的颤动》,《鲁迅全集》(第2卷),第210页。

③鲁迅:《颓败线的颤动》,《鲁迅全集》(第2卷),第210—211页。

④[德]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

⑤张克:《都市精神生活的世故》,《江汉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重要轴心,用哲学语言来说,这是一个“在者膨胀的世界”,原有的社会和精神秩序正在重组,个体如何在这个变动的社会中重塑道德,落实自我的伦理价值,中国人应该建构怎样的国民性格,如何成长成为“新人”,这也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一个维度。“批判也是城市文明的一个特性和内涵,左倾也是,传统的乡村文明的那种均贫富的意识是不能算左倾的,左倾只有在文化和文明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可能出现的,批判也是如此。”^①

鲁迅对于“陌生人”世界的揭示和批判,和现代西方哲学对于“陌生人”社会的同情和认同是截然不同的,这体现了鲁迅在早期市民社会,作为知识分子的反思精神和精英意识。事实上,现代的知识分子也是与城市伴生的,爱罗先珂在中国做过《智识阶级的使命》的演讲,鲁迅也曾指出:“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②但他弃医从文,决心唤醒国人魂灵,立志改造国民性,都具有知识分子的启蒙情怀和改造社会的自觉。鲁迅的“立人”意识,就是市民意识的根源,这里的人,首先是现代人,要建立人国,在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让中国人纳入整个世界语境,促进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转型,建构现代人的精神转型,必须“立人”。鲁迅从老中国的国民劣根性出发,通过批判的方式指出只有否定种种意识,建构起新型的“人”的意识,才能和世界同步,拥有和世界对话的能力。

有学者把“铁屋子”和柏拉图图中的“洞穴”相类比,发现两者的目标都是为了让“城邦/国家”从混乱和堕落中恢复过来,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都是面对生活在混乱中的堕落了‘群众’。”^③鲁迅身处中西城乡交叉之处,对市民生活投入却不沉湎,对乡村批判而不留恋,其蕴含着现代性的早期市民意识形成了重要的精神资源,他在《野草》中的“精神界战士”的形象,实际是对庸常生活的抗议,是国民性改造在城市语境下的一种表现,试图把民族从日常的深潭中拉出,走向新的精神复兴。直到城市化进程已经相当深入的今天,鲁迅精神依然是当下市民身份认同和解决精神危机的重要思想资源。

(责任编辑:蒋永华)

The Strangers' World and Urban Criticism in Lu Xun's *Wild Grass*

ZHANG Juan

Abstract: China's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national enlightenment were wrapped in the worldwide wave of urbanizati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o were still living in a state of unsettledness in the urban society, began to get involved into the social observation and criticism with the aspiration for carrying out enlightenment. Proceeding from the image of urban strangers depicted in Lu Xun's *Wild Gra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age of citizens and urban ethics in this book concerning the real space of the city and probes into Lu Xun's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space where the grass roots citizens lived in the early urban society. There are a group of strangers in *Wild Grass* that can be easily ignored. They are ubiquitous, forming a restricting force over Lu Xun as a fighter in the ideological battlefield; their gossips and arguments constitute for them a daily life strategy; and they form a group who are alienated due to their worship of material success and power. Lu Xun's criticism of such a type of strangers suggests that he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the observation and discovery of "people" in urban life at the spiritual level in his urban writings and thus established a type of urban citizen criticism intended to stimul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modern citizenship.

Key words: Lu Xun; *Wild Grass*; theory of strangers; urban criticism

①曾子炳:《鲁迅在上海——一种现代性的知识分子自觉和实践》,《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逝世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10月。

②鲁迅:《华盖集·通讯(二)》,《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6页。

③段从学:《柏拉图的洞穴和鲁迅的铁屋子》,《文艺争鸣》2015年第11期。